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主编
陈众议

EZRA POUND

庞德学术史研究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Ezra Pound Studies

蒋洪新 郑燕虹 著



译林出版社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主编

陈众议



庞德学术史研究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Ezra Pound Studies

蒋洪新 郑燕虹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庞德学术史研究 / 蒋洪新, 郑燕虹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9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 陈众议主编)

ISBN 978-7-5447-4933-6

I. ①庞… II. ①蒋… ②郑… III. ①庞德, E (1885~1972)—人物研究 ②庞德, E (1885~1972)—文学研究
IV. ①K837.125.6 ②I712.065



书 名 庞德学术史研究

作 者 蒋洪新 郑燕虹

责任编辑 李浩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

插 页 4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933-6

定 价 5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总序

在众多现代学科中,有一门过程学。在各种过程研究中,有一种新兴技术叫生物过程技术,它的任务是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对生物有机体进行不同层次的定向研究,以求人工控制和操作生命过程,兼而塑造新的物种、新的生命。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过程研究,从作家的创作过程到读者的接受过程,而作品则是其最为重要的介质或对象。问题是,生物有机体虽活犹死,盖因细胞的每一次裂变即意味着一次死亡;而文学作品却往往虽死犹活,因为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换言之,文学经典的产生往往建立在对以往经典的传承、翻新乃至反动(或几者兼有之)的基础之上。传承和翻新不必说,即使反动,也每每无损以往作品的生命力,反而能使它们获得某种新生。这就使得文学不仅迥异于科学,而且迥异于它的近亲——历史。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迟早会有人发现美洲;如果伽利略没有发现太阳黑子,也总会有人发现。同样,历史可以重写,也不断地在重写,用克罗齐的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如果没有莎士比亚,又会有谁来创作《哈姆雷特》呢?有了《哈姆雷特》,又会有谁来重写它呢?即使有人重写,他们缘何不仅无损于莎士比亚的光辉,反而能使他获得新生,甚至更加辉煌灿烂呢?

这自然是由文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盖因文学是加法,是并存,是无数“这一个”之和。鲁迅谓文学最不势利,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童年说”和“武库说”更是众所周知。同时,文学是各民族的认知、价值、

情感、审美和语言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因此,文学既是民族文化及民族向心力、认同感的重要基础,也是使之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鲜活基因。也就是说,大到世界观,小到生活习俗,文学在各民族文化中起到了染色体的功用。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或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淹没的个性。惟其如此,世界文学和文化生态才丰富多彩,也才需要东西南北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同时,古今中外,文学终究是一时一地世道人心的艺术呈现,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表达与传递、塑造与擢升着各民族活的灵魂。这正是文学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永久价值与恒久魅力之所在。

于是,文学犹如生活本身,是一篇亘古而来、今犹未竟的大文章。

此外,较之于创作,文学研究则更具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属性,因而更取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社会发展水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如是,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外国文学研究更是如此。虽然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学运动十分重视外国文学,但从实际成果看,1949年前的外国文学研究却基本上属于旁批眉注、前言后记式的简单介绍,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因此,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几乎可以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全面展开的,而系统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这还是第一次。

学术史研究也是一种过程学,而且是一种相对纯粹的过程学。不具备一定的学术史视野,哪怕是潜在的学术史视野,任何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几乎都是不能想象的。

然而,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许多人不屑于相对客观的学术史研究而热衷于空洞的理论了。在有些人眼里,甚至连相对客观的真理观也消释殆尽了。于是,过去

的“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语殊”，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于是，众声喧哗，且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言必称虚拟和不确定。这对谁最有利呢？也许是跨国资本吧。无论解构主义者初衷如何，解构风潮的实际效果是：不仅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威胁。然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而“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公司时代才可能产生。

且说经典在后现代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它们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的颠覆。因此，经典的重构多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正是基于上述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于2004年着手设计“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计划，并于翌年将该计划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十一五规划”。这是一项向着重构的整合工程，它的应运而生，标志着外文所在原有的“三套丛书”（即20世纪60至90年代——“文革”时期中断——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工作的基础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也意味着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已开始对解构风潮之后的学术相对化、碎片化和虚无化进行较为系统的清算。

于是，关乎经典的一系列问题将在这一系统工程中被重新提出。比如，何为经典？经典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经典重在表现人类的永恒矛盾（用钱锺书的话说是“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呢，还是主要指向时代社会的现实矛盾？它们在认知方式、价值判断、审美取向方面有何特征？经典及经典批评与时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关系何如？批评及批评家的作用（包括其立场、观点、方法及其与时代社会的一般和特殊关系）又如何？此外，经典作家的遭际与性情、阅历与禀赋，经典的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以及文学的一般规律和文学经典的特殊性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将是本工程需要展示并探讨的。

且说世界文学一路走来,其规律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童年的神话、少年的史诗、青年的戏剧、中年的小说、老年的传记是一种概括。由高向低、由外而内、由强至弱、由大到小等等,也不失为一种轨辙。如是,文学从摹仿到独白、从反映到窥隐、从典型到畸形、从审美到审丑、从载道到自慰、从崇高到渺小、从庄严到调笑……终于一头扎进了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死胡同。小我取代了大我,观念取代了情节;“阿基琉斯的愤怒”变成了麦田里的脏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变成了“我做的馅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是谓下现实主义。当然,这不能涵盖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事实上,认知与价值、审美与方法等等的背反或迎合、持守或规避所在皆是。况且,无论“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经典是说不尽的,这也是由时代社会及经典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生发的。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向来重视文学,尤其是经典作家在反映和揭示社会本质方面的作用。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社会时就曾指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恩格斯也说,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则干脆地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并不是说只有文学才能揭示真理,而是说伟大作家所描绘的生活、所表现的情感、所刻画的人物往往不同于一般抽象的概括、数据的统计。文学更加具体、更加逼真,因而也更加感人、更加传神。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载道与传道功能更不待言。站在世纪的高度和民族立场上重新审视外国文学,梳理其经典,展开研究之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动和了解不同民族的个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从而为我们借鉴和

吸收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胡锦涛前不久说过,“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的大势,坚持立足国情,同时又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坚持立足当代,同时又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和“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思想一脉相承。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学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和介质,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见证,同时也是一时一地人心、民心的最深刻、最具体的体现,而外国文学则是建立在外国各民族无数作家基础上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认识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象反映。研究人心自然不能停留在简单抽象的理念上,因此,走进经典永远是了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人心、民心的最佳途径。换言之,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而其中的经典(包括其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恰恰是这些变化着的活的灵魂的集中体现。

如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从我出发,以我为主,瞄准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进行历时和共时的梳理。其中第一、第二系列由十六部学术史研究专著、十六部配套译著组成:第一系列涉及塞万提斯、歌德、雨果、左拉、庞德、高尔基、肖洛霍夫和海明威;第二系列包括普希金、茨维塔耶娃、康拉德、狄更斯、哈代、菲茨杰拉德、索尔·贝娄和芥川龙之介。

三

格物致知,信而有证;厘清源流,以裨甄别。“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系列,顾名思义都是学术史研究(或谓研究之研究)。学术史研究既是对一般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文化积累工程,同时还可以杜绝有关领域的低水平重复。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通过尽可能抽丝剥茧式的梳理,即使不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至少也能老实地

将有关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包括有关研究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公之于众,以裨来者考。如能温故知新,有所创建,则读者幸甚,学界幸甚。相配套的经典论文翻译,则遴选有关作家作品研究的阶段性和标志性成果,其形式类似于外文所先前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此次面世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经典作家(作品)的学术史梳理。这是相对客观的,但其中的艰难也不可小觑。首先,学术史梳理既不像平素泛舟书海,拾贝书海,尽意兴而为之的俯拾由己和随心所欲;其次,牵涉语种繁多,而且经过20世纪的形形色色的方法论和批评思潮的浸染,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已不为过。因此,要在浩如烟海的研究史料中攫取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方法,实在是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事情。战战兢兢,生怕挂一漏万,自不待言,且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因此,我们只能择要概述,甚至把侧重点放在经典作家的代表作上。不然纵使篇幅再大,也难以涵括浩瀚的文献资料。换言之,去芜杂的枝蔓和重复的敷衍,留精粹要义和真知灼见是必然的,但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它考验我们涉猎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也是检验我们学术水准和价值判断的重要环节。

第二部分研究之研究何啻是一大考验。都说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在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标新立异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风潮之后,在各种思潮、各种方法杂然纷呈的情况下,如何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不炒冷饭,殊是不易;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就更是难上加难。反过来看,正因为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和批评的多元,也才有了我们展示立场、发表见解的特殊理由和广阔余地。举个简单的例子,解构主义针对二元论的颠覆虽然是形而上学的,却不可谓不彻底。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学者怀疑甚至放弃了二元思维,但事实上,二元思维不仅难以消解,而且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仍将是人类思维的主要方法。真假、善恶、美丑、你我、男女、东方和西方等等实际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学者,面对西方话语,我们并非无话可说。总之,从文学出

发,关心小我与大我、外力与内因、形式与内容、反映与想象、情节与观念,以至于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西方与东方等诸如此类的二元问题,以及经典在民族和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依然可以是我们的着力点。当然,二元论决不是排中律,而是在辩证法的基础上融会二元关系及二元之间所蕴藏的丰富内涵和无限可能性。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广开言路,但日新月异中不乏矫枉过正、时髦是趋。比如大到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小到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等等,都大有乾坤倒转、黑洞化吸之势。至于意识形态“淡化”之后,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意识形态更是有增无已;真假不辨、善恶不论、美丑混淆的现象所在皆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从而使抽象的人性淹没了社会性;普世主义势不可挡,以致文化相对主义甚嚣尘上。文学从大我到小我,从外向到内倾,从摹仿到虚拟,从代言到众声喧哗;真实给虚幻让步,艺术向资本低头;对妖魔鬼怪和封建迷信津津乐道,任帝王将相和无厘头充斥视阈,能不发人深省?然而,经典作家是说不尽的,以上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是无法穷尽的。用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伟大的经典具有“自我翻新”的本领。至于何为经典,虽然也是个说不尽的话题,但用简单的方式综观前人的观点,也许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它们必须体现时代社会(及民族)的最高认知和一般价值(包括人类永恒的主题、永恒的矛盾);二是其方法的魅力及审美的高度不会随着岁月的更迭而褪色或销蚀。当然这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一种说法。而本课题便是关乎经典其所以成为经典的一种较为复杂的论证方式。需要说明的是,经典不等于市场。用桑塔亚那的话说,经典不在于一时一地喜欢者的多寡,而在于喜欢者的喜欢程度。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这话也就更加全面了。

学术史研究的最后部分为文献目录。它在尽可能详尽的基础上,还要有所选择。不然,展示一个经典作家的学术史,光文献目录就可以编辑厚厚的几大本。因此,去粗存精,是为重要或主要文献目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中长期目标是在作

家作品和流派思潮研究的同时,进行更具问题意识的学术史乃至学科史研究,以期点面结合,庶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若能密切联系实际,促进中华学术的繁荣、发展和创新,则读者幸甚,我等幸甚。无疑,此工程面向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希望有志于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同仁踊跃加盟、不吝赐教。

陈众议

2010年1月

绪言

朱熹《四书集注》的前言中写道：“所谓‘经典’者——经，常也（《广雅·释诂》）；典，常也（《尔雅·释诂》），从册在兀上，尊阁之也（《说文》）。”^①大凡能够成为经典之作，必然是经过时间的检验，具有恒久意义的作品。故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②虽说经典具有超越时空表现恒久至道的功用，但不是所有经典都好读，或者令人们愿意去读。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戏言经典时说：“经典是人们称赞，却很少有人读的东西。”此话用在西方现代派大家如乔伊斯（Joyce, James）、艾略特（Eliot, T. S.）、庞德（Pound, Ezra Loomis）、普鲁斯特（Proust, Marcel）等身上是切中肯綮的，人们都知道他们是大名鼎鼎的作家，但他们的作品并不好懂。这些现代派的大家都是上世纪的人，离今天并不久远，经过一个世纪的大浪淘洗，不管有多难读，也不管你是否接受，他们的著作依然在书店、在图书馆摆放着，在大学课堂被讲解着，研究者不乏其人。时间是检验经典的最好标准。然而，我们是否思考过，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形成过程中到底有哪些潜在的品质昭示其能成为未来的经典呢？研读庞德的成长史，至少有两点颇为明显：一是惹眼，他年轻时就立志做诗人，从美国横渡大洋来到欧洲，初出茅庐，作品一出手，就引起评论界的注意。虽然他的许多作品深奥难懂，甚至连一些研究他的人也承认读懂他不容易，但他一辈子无论在哪，都会有明星般的效应，哪怕是蹲监狱，拥趸者也是络绎不绝。

① 朱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1页。

② 刘勰：《文心雕龙》（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第22页。

研究他的学会、杂志、论文、专著、百科全书,林林总总,应有尽有。二是他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庞德的人生经历复杂多样。他纵横美国与欧洲,领导和推动了近一个世纪的文学运动,是美国诗坛的风云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不慎为罗马电台播音并散布一些错误观点,为此遭受十余年牢狱之苦并饱受争议。他的文学思想与文化批评极为博大开阔,但他的某些政治经济主张又颇为偏激与幼稚。他的许多诗学和文化批评思想不单是他那个时代创作思想的重要源泉,而且对当代英美诗坛仍有影响。他热爱中国文字、诗歌与儒家经典,并借助中国文化为英美现代诗歌增添绚丽色彩,同时中国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亦从他领导的意象派那里得到启发,开始了新诗改革。正因为他是位涉猎广泛而又颇具争议的人物,庞德学研究才有厚实的基础。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Calvino, Italo)说:“经典就是你经常听到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作品。”^①这句话用在我近十年对庞德的阅读与研究上可谓恰如其分。俗话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形容的是一个人有着不畏艰险的精神,而我研读庞德并不是出于勇气,而是源于缘分。早年做艾略特研究,发现要弄懂艾略特必然要读与他同时代的庞德。尽管庞德难读,但必须要读。因为他难懂,所以我只能反复读。几千年前中国的孟子说:“读其书,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的意思是读一个人的著作,吟咏一个人的诗歌,不了解其为人,是不够的,还要联系他那个时代来探讨。这就要追溯历史,并与古人交朋友。这些话可谓指导我研读庞德的法宝。十年来,我除了阅读研究他的著作,还利用出国讲学和访问的机会探访庞德生活过的地方。2004年我去欧洲访学,有一天我特地在黄昏时分进入巴黎地铁站,正值下班高峰,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巴黎地铁的灯光效果显然比庞德那时改善了许多,但我还是能依稀感受到诗人描写的小孩与妇女忽明忽暗的情景:“人群中这些脸的憧影/湿黑的枝上的花瓣”。2012年我在美国访学,利用假期从西部辗转来到费城,到庞德以前住过的房屋、读过书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实地调研,我真实地体验到美国《独立宣言》诞生的历史名城费城以及闻名世界

^① 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页。

的宾州大学对庞德早期思想的形成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迄今为止,我只能说自己尽了很大的努力去了解庞德,但离真正把握好庞德及其作品尚有距离。众人皆知,庞德作品难懂,且鄙人天性愚笨,费了十年苦功,也只能说还在重读庞德。几年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陈众议所长交给我一个光荣任务:做庞德学术史研究。这正好给了我一个重新学习的机会,心想自己多年研读庞德但还未弄懂的尴尬情况可以借此得到改善,通过庞德学术史研究我倒是可以把别人研究庞德的体会转述给读者,而且可以通过学术史的清理来弄清楚一些模棱两可的问题,于是我爽快地接受了。后来在调研与写作过程中发现此事很不容易,因为构成庞德的文化因素复杂,研究他的材料繁杂多样。故呈现给读者的这本小册子若能起到鹦鹉学舌的作用,自己已觉得很宽慰了。

诗人庞德于1972年去世,时间并不久远,庞德研究以及相关学术活动方兴未艾:世界庞德研究学会,定期举行庞德研究专题会议;庞德研究专刊(*Paideuma*)^①,从上世纪70年代开创之日起至今仍然不衰;每年全世界都有以庞德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博士论文和学术专著发表。因为庞德的复杂性,研究者的研究角度亦是繁杂多样。比阿特丽斯·里克斯(Ricks, Beatrice)在1986年出版了《埃兹拉·庞德:研究他的书目》(*Ezra Pound: A Bibliography of Secondary Works*)^②,其中列出有关庞德研究的著作与论文3696条。庞德研究权威耶鲁大学的唐纳德·盖洛普(Gallup, Donald)在1963年推出《埃兹拉·庞德的书目》(*A Bibliography of Ezra Pound*),1970年他又出版了一本《关于

① 该杂志是专门研究庞德的学术刊物,由美国诗歌基金会创办,1972年在缅因大学出版社印行,是年印出两期,编委会成员皆是世界研究庞德的权威。资深编辑:加州大学休·肯纳(Kenner, Hugh),伊娃·赫斯(Hesse, Eva);编辑:斯坦福大学唐纳德·戴维(Davie, Donald)、耶鲁大学唐纳德·盖洛普(Gallup, Donald)、北卡罗来纳大学刘易斯·列瑞(Leary, Lewis);执行编辑:缅因大学卡罗尔·F.特雷尔(Terrell, Carroll F.)。协助编辑有:伦敦的威廉·库克森(Cookson, William)、东京的岩崎良造、贝尔法斯特的G.森(Singh, G.)、巴黎的多米尼克·德·鲁(Roux, Dominique de)、纽约的哈里·米查姆(Meacham, Harry)、魁北克的威廉·蒂尔尼(Tierney, William)、印度的德巴·帕特内克(Patnaik, Deba)。

② Ricks, Beatrice: *Ezra Pound: A Bibliography of Secondary Works*, Metuchen and London: The Scarecrow Press, 1986.

当代书之编目：埃兹拉·庞德》(*On Contemporary Bibliography: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Ezra Pound*)^①。在后一本书中，他提出编制参考书目的原则：编目者编制文献书目不仅针对读者，更重要的是针对研究者，以便他们将该书目当参考工具用，因此，编制作家的书目时要注意树立作者已版作品的经典意识，注意其作品首版的情况，对每一部重要作品要弄准它的发表时间、完稿时间、印刷数量、售价等。基于这些原则，盖洛普于1983年出版《埃兹拉·庞德：书目》^②，这是一部庞德学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该书详细考证了庞德的文章、译文和著作的发表过程，包括发表时间、地点、出版社、杂志社以及同一部作品的修改情况与不同版本，为庞德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该书乃研究庞德必备的参考书。2005年出版的《埃兹拉·庞德的百科全书》(*The Ezra Pound Encyclopedia*)^③涵盖了庞德主要作品的诞生过程和内容介绍，与庞德相关人物的研究，以及研究庞德的大家的人物简介，该书亦是颇有价值的参考书。庞德学的兴旺景象与前辈扎实的研究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本书的总体框架与整套丛书的格式一致，分为三个部分：庞德学术史，庞德学术史研究，附录。关于其中的具体谋篇布局，我的考虑如下：

其一，作家及其作品的诞生与批评界的评论相辅相生，因此作家的成长史也与关于他的学术史相伴而生。陈平原先生在论晚清学术史的意义时说过：“从开天辟地一直说到眼皮底下，大概是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辩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④越是好的作品自它诞生之日起，越会引起世人的关注。庞德就是这样案例，他早年到伦敦刚立稳脚跟，就吸引了批评界的眼球。随着他影响力的扩大，研究

① Gallup, Donald: *On Contemporary Bibliography: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Ezra Pound*, Austin: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0.

② Gallup, Donald: *Ezra Pound: A Bibliography*,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Press of Virginia, 1983.

③ Tryphonopoulos, Demetres P. and Adams, Stephen J.: *The Ezra Pound Encyclopedia*, Westport and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5.

④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页。

他的学术文章与论著也像滚雪球似的增加。基于以上考虑,本书里将庞德作为诗人与批评家的发展进程同与此相随的评论材料相结合,按时间顺序来展开研究。因为这两者共荣共长,庞德的事业进步自然引起批评界的反响,而评论界的关注又扩大其影响^①,所以这两条线索交错来写,方能血肉相连、形象完整。

其二,庞德及其作品的文化成分是多元的,他的影响主要在英美世界,也涉及其他国家,因此研究庞德的学术论题是广博的,研究庞德的学者亦广布于世界各地。庞德出生在美国,主要在美国接受教育。但他二十六岁前曾先后五次到欧洲暂居,辗转多国,欧洲成了他第二故乡,他所接受的文化影响是多元的。他通晓英、法、西班牙、意大利等语言,对古英语与中世纪文学颇有研究,翻译了一些意大利语、法语和拉丁语诗歌。他对东方文化亦有研究,翻译了《诗经》、《大学》、《中庸》、《论语》等中国经典著作。他还多才多艺,在音乐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皆有论述。庞德的博学必然为庞德学术史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也增加了难度。说研究的空间宽广,是因为他丰富多彩,可供研究的选择余地大;说研究的难度高,是因为研究的涉及面广,语种多,除非研究者本人也像庞德那样博学,否则就得依靠他人的智慧,方能完成较为完整的一部学术史。

其三,庞德本人及其作品颇有争议,因此庞德学的许多领域也聚讼纷纭。例如,关于庞德的译作,有人称其不是翻译,而是创作,有人称是创造性翻译,有人称这是意译,有人认为他的翻译是参考了其他译本,并请教过他人,虽有不准,但总体看来与原文精神合拍,且译文优美……作为学术史的研究著作,应该理清这些观点,并考察庞德译了哪些作品,哪些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哪些是创造性翻译,庞德翻译的理

^① 格雷戈里·巴恩希泽尔(Barnhisel, Gregory)在《詹姆斯·劳克林,新方向与埃兹拉·庞德的重塑》(*James Laughlin, New Direc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Ezra Pound*)一书中指出:不仅是詹姆斯·劳克林这样的出版商帮助打造庞德成为美国文学史上如此重要的人物,许多批评家、诗人、记者、文学代理人、教授、立传者,如T. S. 艾略特、休·肯纳、诺厄勒·斯托克(Stock, Noel)等也都在庞德的故事塑造中扮演了极为突出的角色。见: Barnhisel, Gregory: *James Laughlin, New Direc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Ezra Pound*, Amherst and Bost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5, pp. 3—4.

论依据在哪里。再如,人们一提到庞德往往将他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联系起来,那么他到底对现代主义运动的形成与发展、现代诗的形式变革做了哪些贡献?学界还有人将他划归为后现代主义,甚至称他为美国后现代诗歌的教父,根据在哪里?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既然庞德那样学识渊博且富有社会责任感,他怎么会在二战期间与墨索里尼走到一起?他为罗马电台播音主要讲了什么?他这样做的深层政治思想意图是什么?事后美国是如何处置这位诗人的?这些问题是学界长期探讨的研究庞德的难题,也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对于众所关心的问题本书第二编——学术史研究部分力求深入探讨。该部分厘清这些问题的本质所在,梳理各家某些论争的观点,并结合庞德所处的时代背景,提出自己的学术主张或者努力的方向。因此在硝烟弥漫、针锋相对的论争中理出各派观点的来龙去脉,并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学术观点,乃本书的宗旨之一。

这部书能得以顺利完成得到了许多方面的支持。首先,要感谢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十几年前我就读于此并得到袁可嘉等众多先生的指教与关爱,毕业后多年外文所依然厚爱我,将如此重要的科研项目交付给我。鉴于我的研究时间不集中,陈众议所长对我予以足够的宽容与理解。其次,本书涉及面广,需要的资料多,调研的工作量大。中国部分的研究综述由我的博士后李春长与我合作完成,重要文献目录与索引部分我的硕士生李婧勃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在此我要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感谢。本书是我与郑燕虹教授共同合作的成果,我承接陈所长交给的任务时,燕虹获国家留学基金正在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做访问学者,她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并担任了学术史部分第二章和第四章的写作。我负责学术史的第一章、第三章,学术史研究和重要文献。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拙著并不厚,但写作的时间较长,难度较大,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专家的指教与朋友的帮助,这里要特别感谢:陈众议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叶维廉(Yip, Wai-lim)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张隆溪教授(香港城市大学)、陆建德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蒲恩龄(Prynne, J. H.)教授(剑桥大学)、钱兆明教授(美国新奥尔良大学)、叶扬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区钜教授(中山大学)、张子清教授(南京大学)、傅浩研究员(中国